

●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从制造白炽灯起步到享有盛誉的特色专业



从1963年跟随蔡祖泉师傅开始电光源和照明工程研究到2006年在电光源研究所退休,我在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工作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期间我亲历了电光源研究所成立、发展的过程,深深体会到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关怀。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温在党的领导下电光源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以鼓舞年轻一代为民族振兴而奋斗。

1963年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加入了蔡祖泉师傅领导的电光源研究课题组,当时课题组只有4人,除蔡师傅外还有一名玻璃工和两名技术员。记得当时校党委领导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告诉我蔡师傅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党的培养下,由一名玻璃工人成长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1956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还对我说,我是第一个跟蔡师傅做徒弟的大学毕业,要好好向他学习,争取入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我们课题组遵循党的教导,工作始终有明确的目标: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富强而努力。蔡师傅也经常对我们讲他是如何走上电光源和照明技术研究的: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首都北京建设了十大建筑,世界为之瞩目,但是照明还是陈旧落后,用的还是普通白炽灯,与国外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蔡师傅觉得他有玻璃制作的技术,校内也有制造电真空器件的条件,应该在这方面为国家做一点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从此他和华中一教授合作,开始了我校电光源和照明技术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六十年代初,新闻摄影用的是大小如同篮球的白炽灯,而国外已经有了大小如同半支铅笔的卤钨灯。在化学系教师的帮助下,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研发成功了卤钨灯,在新闻电影制片厂试用

并获得成功。我们还研制成功长弧氙灯,用于我国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改写了我国没有灯光足球场的历史。后来又陆续研发成功一系列光学仪器使用的光谱灯。

1964年,我们电光源研发课题组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组织上分配来了周太明、胡荣生等一批大学生,课题组变成了电光源实验室,实力大大增强。我们相继研发成功200千瓦长弧氙灯,并在1965年的北京高校展览会上展出。灯点在化工学院六楼屋顶上,学生可以在下面的广场打球,读报,影响很大。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邓小平同志也专程来参观,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我们又先后研发成功了用于航天工业的太阳模拟器用的20千瓦短弧氙灯,这是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专门委托我们研发的。成功以后,王先生还特地请我们吃饭,以示鼓励。

在推进科研工作进展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和企业的联系,尽可能快地把新的成果无偿提供给企业。1962年研制成高压汞灯,很快在1964年,由亚明灯泡厂生产,上海道路照明就用上了高压汞灯。道路照明不再用白炽灯了,路面亮度大大提高,交通事故大幅减少。1965年卤钨灯在沪光灯具厂大批量生产,解决了新闻电影摄影问题,也用于大型工地、厂房的照明。由于工厂的大批量生产,急需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我们开办了各类短训班,还招收了工农兵大学生,为社会培养光源和照明人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党中央下决心拨乱反正,给我们电光源事业带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1977年蔡师傅随中国人大代表团出国访问,他委托我代他参加高教部的科技发展规划会。会上复旦大学提出成立数学所、近代物理所、遗传所和电光源研究所。第二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并由蔡祖泉担任所长,下设光源、电器、材料和测试四个研究室,以后又增加了照明

视觉研究室等。电光源研究试制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展了视觉研究、照明设计的应用研究等,先后研制成功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紧凑型荧光灯、真空紫外灯。同时对智能化照明、景观照明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

为了满足对光源和照明专业人才的需要,1984年成立了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培养本科学生,并在同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后又开始招收博士生。与此同时,还邀请了多位国外知名学者来讲学,与许多优秀大学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派出教师去国外学习。例如:徐学基、何鸣皋、胡荣生、诸定昌、陈大华等到美国国家计量局学习(现已改名为美国国家计量与标准技术研究所),朱绍龙到牛津大学学习,周太明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方道映到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等等。还与包括松下电子和岩崎电子、飞利浦和美国通用电气等国外企业合作,提高了研发能力,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2007年,电光源所作为东道主在复旦大学举办了第11届国际电光源科技研讨会。和中国照明学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26届国际照明大会。电光源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大家记得蔡师傅常常告诫我们说,中国已经是照明电器的生产大国,也将成为照明电器的研发强国。这是他的一个奋斗目标。现在,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岁月匆匆,如今我已是80多岁的老人,退休十多年了。电光源研究所已经有许多青年俊杰接过了研究重担。开始了智能照明、固态光源、远紫外光源等一系列新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希望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努力,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更大贡献。

文/朱绍龙(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教授)

“你们不是在等待我 是在等待哲学”

这些年,如若提及哲学和思想领域,一定绕不开“王德峰”这个名字。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他教授了70后、80后、90后和00后四代学生。王德峰习惯在袅袅烟雾中投入讲课,在复旦园里,他绝对是一个神奇又厚重的存在。

在今天的时代状况里,哲学的孤独很是自然,但王德峰并没有感受到。除了哲学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非哲学专业的同学也非常喜欢去上他的哲学课。因为前来“蹭”听的学生太多,他的课堂不得不从50人的小教室换成了百来人的大教室,最后不得不换成了能坐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当他走进课堂,迎向满室学生充满期待的眼光,脱口而出的是这样的开场白:“你们不是在等待我,是在等待哲学。”

王德峰说:“哲学的学习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它往往打破我们对事物通常的理解和框架。”但是对很多人而言,想要习得哲学并非易事,既很难完全理解晦涩的哲学原著,又苦于难以找到一位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又能深入浅出讲授的老师,来答疑解惑。

或许,我们可以从王德峰这本《哲学导论》出发。

王德峰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始于1996年。二十余年的教学经验及受学生欢迎程度足以说明这门哲学入门课程的分量。《哲学导论》一书便生发于此一课程的讲稿。王德峰在后记中说:“这本书严格说来不是‘教材’,而是路标,标示了我与年轻学子之间为守护思想的事业及其尊严而展开的对话历程,其中的痛苦和欢愉,是凡听过我讲课的本科学生都曾体验过的。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铭记着这段经历。”

哲学的真正使命究竟是什么?她究竟能否引导我们达到确凿无疑的真理?这两种对于哲学的正相反对的极端看法都是不正确的。

一种看法认为,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居于君主地位,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最高真理的揭示者,是“科学之王”。

另一种看法则以为,哲学是不着边际的玄想,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是“不能烤面包”的高谈阔论,是学问和修养的表面装饰。

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哲学的误解。哲学从不放弃对真理的



《哲学导论》

王德峰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严肃追求,但始终对每一次追求所得抱着严格的批判态度。她并不自诩真理在握,只等着人们的朝拜,而是虚怀若谷地迎接更进一步的探索。她意味着新境界的不断打开,她是通向智慧道路的不停息的开拓者。

值得庆幸的是,上述两种对哲学的误解在当年轻一代的学子中正愈见其稀。他们对哲学正开始形成真诚的渴望。他们或许并不以哲学为专业,他们研究历史、语言等人文科学,或者研究诸如经济学、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或研究数学、自然科学,但对哲学却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表现出了关注和热情。

我们目前还无法准确地估量这种现象的全部意义和前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哲学以她对人类文明精神之根的追问和对人的真实价值的探求,代表了当代人内心最深刻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惟在年轻而纯真的心灵中才最易生长出来。

如何写出一部合适的“哲学导论”?王德峰认为,最好的态度是把“哲学导论”的写作也看作是哲学研究范围内的一种努力。在这种努力中会有不同“哲学观”的竞争,这自然也体现了哲学的本来精神。因此本书采取了如下的写作思路:

对哲学的介绍围绕哲学的几大问题域并依其内在关联而顺次展开;

着力于向读者提示哲学问题的缘起、性质、意义、求解的动力与途径以及这些问题与人类生活总体的关系;

把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探讨与哲学思想史有机结合,呈现不同的思想境域;

致力于展示哲学思辨应达到的水准,以引导读者进入对哲学之意义的解悟。 文/陈丽英